

汉语方言现象与华人文化风情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千姿百态的汉语方言现象,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华人文化风情。本文根据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不同情况,分三大部分,阐述相关问题,提出笔者见解。比如:我国南部已然形成“梗字南音文化圈”,“梗”的注音应兼顾“整体汉语”,并关注“全球华语”。又如:文艺作品中的方言现象有“明知而用”和“顺手写就”两种情况,《红楼梦》研究若能从语言运用的角度作深度切入,弄清种种事实的来龙去脉,“红学”成果必定更为丰满。再如:某种方言句法格式可以向通语转化,应描述其不可替代的语用价值,同时指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文章末尾为“两点感悟”:其一,汉语方言是个巨大宝库,联系华人文化风情研究方言现象,有利于多种学科的发展。其二,研究方言问题,特别需要弘扬以“崇实”为核心思想的朴学精神,现阶段非常有必要强调这种治学风气。

关键词 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华人文化;讲实据;求实证

语言有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普通话如此,方言也如此。跟普通话相比较,对方言现象的感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易感层面。语音和词汇,属于这一层面。其二,隐约层面。语法,属于这一层面。不管属于哪一层面,汉语方言现象都与华人文化风情息息相关。

一、语音

第一,在方言的语言三要素中,语音是最易感的要素。

从学术角度看,方言分区,七区也好,八区也好,十区也好,所据的基本标准都是语音。

从听觉角度看,听别人说话,在听其内容的同时,很自然地要推测说话人的籍贯,进而推测说话人的社会背景、文化素养等。古人常常提到的“乡音”,即方言语音,诗词和散文里面皆可见到。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 | 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宋陈与义《点绛唇·紫阳寒食》) | 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北史》卷三十八) 人际交往,人群相处,相互间往往用听口音的办法来判断籍贯。例如:乡亲,

听口音你是河南人。(杜鹏程《保卫延安》) | 唏,英雄末路是不会留下姓名的,听口音好像是无锡。(陆文夫《人之窝》) | 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在轿边大声喧哗,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尤凤伟《金龟》) | 听口音,这个人很像是他的家乡一带的人。(吴强《红日》) | 今天净是谁们呀,怎么听口音都生呼呼的。(孙犁《风云初记》) 直言“乡音”也好,讲说“听口音”的感觉也好,都触及了乡土文化。

第二,在语言三要素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音异况之对应,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

读古今小说,观察小说作者的语言运用,可以知道,最注意方言、喜欢时不时讲说方言问题的作者,应是吴趸人。他所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多处穿插有方言知识,说明了他具有声韵方面的修养。例如该小说中有如下的描写。

端甫道:“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那里话都能说。”我说:“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端甫道:“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我道:“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

收稿日期 2013-07-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11&ZD128)

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读成‘孤’音，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一定读成‘粗’音，‘磨’字一定读成‘模’音的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端甫道：“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怎样？”我道：“上海话是五歌韵混了六鱼、七虞，广东话却是六鱼、七虞混了四豪，那‘都’、‘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端甫道：“那么‘到’、‘妒’也同音了？”我道：“自然。”端甫道：“‘道’、‘度’如何？”我道：“也同音。”端甫喜道：“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第34回）

这里头的对话，说明主人翁吴继之（“我”）善于把握语音对应规律，把方言问题和诗韵知识联系了起来，道出了不同地域的方音流韵。

在现代，特别了不得的人物，是语言天才赵元任（1892—1982）。现在，只要在网上一搜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的很多故事。比如，有下面这么一段近似神话般的描述。

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为“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跟行李员说巴黎土语，对方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无限感慨：“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叹道：“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当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他掌握语言的能力之所以那么惊人，正是因为他能迅速悟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某种方言乃至某种外语的规律。^①

以上的传奇性叙述，是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查考。然而，无论如何，都可以让人们知道，悟透“声韵调系统”，把握“规律”，十分有用，这可是大学问。这里头所涉及的，固然也有词汇和语法的问题，但主要的是语音；这里面所说的语言，固然包括外语，但特别突出了

汉语的普通话和方言。不仅如此，这里面还凸显了相同的“乡音”，换来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认同与由此而产生的浓浓乡情。

第三，处理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音的关系，要考虑“整体汉语”。

“整体汉语”这个概念，是张振兴提出来的，大有认知作用，对于处理好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音的关系具有导向性。^②比如，稻米当中有一种米，书写形式是“米+更”，即“粳”。这个字，怎么读？最权威的字典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注为“jīng”。

2012年3月，《楚天都市报》发表《水稻院士张启发认为“粳”字读错了》的报道。报道说：

粳稻，是我国南方主要农作物之一。“粳”字到底应该怎么读？水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提出，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应为“gěng”，而不是“jīng”。他的呼吁引发水稻科学界及相关学者的热烈回应，已有来自全国14个省、3个直辖市近200名专家表示支持，其中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1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游修龄等185位专家，在《关于修订粳(geng)字读音的建议书》上面签名，准备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商务印书馆呈报。^③

民以食为天。这个字如何注音，关系甚大，不可忽视。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可知许多地方这种米不叫[tɕiŋ]（即汉语拼音的jīng）米。比如柳州、南京、上海、扬州等地，读[kəŋ]或[kən]（即汉语拼音的geng或gen）。各地声调有所不同。还有其他地方读音相近。（第4968页）^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没提到武汉，但武汉一定是读[kəŋ]（或[kən]）。笔者在武汉生活了60年，敢于断定：如果有人去粮店或超市，说“我要买jīng米”，卖者一定不知所云。在中国国土上，南部人口密集，把这种米说成geng米或gen米的地区起码有好几亿人口，形成了一个“粳字南音文化圈”。谁也无法改变“圈”里辈辈承传的音读习惯。“整体汉语”这个概念，可以涵盖“全球华语”。进一步了解境外外国情况，可以提升认识。境外，台湾地区，据李行健主编《两岸常用词典》，“粳”读gēng。该词典，“台湾读音以《国语一字多音审订表》为准”。^⑤香港澳门地区，华人一般讲粤语。香港中文大学蒋平教授告知，经过同系搞语音学的香港人同事查考粤语拼音，

确认“粳（米）”读音为 gāng⁵⁵，国际音标为 [kəŋ⁵⁵]。国外，新加坡华人，美国许多地区的唐人街华人，他们用以相互交际的华语特别值得注意。新加坡籍、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中心工作的谢淑嫔博士告知，认识“粳”这个字的新加坡人，也和武汉人一样念成“geng”，第三声。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夏威夷大学李英哲教授告知，夏威夷唐人街老一辈的人多半是中山、隆都人，猜想他们的发音可能接近 kang 或 keng。（邢按：国际音标的 k，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 g。）统观全局，《新华字典》也好，《现代汉语词典》也好，最好在把这个字注为 jīng 之后，续上一个说明：〈方〉我国南部许多地方读作 gēng 或 gěn。这样，会更为妥善。事实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已经提供了一个范例：【粳米】济南 [tɕiŋ（或 kəŋ）mi]。（第 4968 页）这就是说，在济南，这种米有两个音，因此如实给出了两个音；放大到全中国，乃至放大到境外，从“整体汉语”通盘考虑，如果也给出两个音，肯定更贴近事实，更贴近当今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充分体现字词典注音的科学性。

由“粳”的读音可以知道，如果从词汇角度来观察，作为词的“粳米、粳稻”，其读音在方言分区上是有所突破、并不整齐划一的。柳州、南京、扬州属官话区，但“粳”的读音不同于北京话，却跟属吴语区的上海读音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发生在词汇系统的问题，以及发生在语法系统的问题，不受方言各大分区的封闭式管控，另有发展轨迹，另有自己的“文化圈”。

二、词汇

第一，在方言的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是较易感的要素。

同一事物，不同地区往往给出不同的命名。比方“玉蜀黍”，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可以知道：在牟平、南京，叫“玉米”；在徐州，叫“棒子”；在济南，叫“玉米”，也叫“棒子”；在洛阳，叫“玉蜀黍儿”，也叫“老玉米”，也叫“棒子”；在太原，叫“玉茭子”；在杭州，叫“玉黍”；在成都、西宁，叫“玉麦”；在哈尔滨，叫“包米（苞米）”，在上海，叫珍珠米（上海新派也有人叫玉米）；在广州、东莞，叫“粟米”。还有一个“包谷（苞谷）”，《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里查不到。但我在武汉生活了 60 年，知道武

汉人通常叫作“包谷（苞谷）”。各地的不同称说，显现了各异的地域风情。

由于直观性强，跟日常生活相关，各地的不同名目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多次展示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该小说中这么写道：有一种人，上海叫“书毒头”，就是“书呆子”。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第 22 回）一个壁虎（即守宫，北人称为壁虎，粤中谓之盐蛇），生得通身碧绿，十分可爱。（第 66 回）那铜烟锅儿（粤人谓之烟斗，苏、沪间谓之烟筒头），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第 67 回）“书毒头”（上海）、“盐蛇”（粤中）、“烟筒头”（苏沪间）等，都富于地方特色，反映出不同地方的社会习俗。

第二，方言词有可能向普通话转变。

除开专名，各个方言在用词上也各有特色。有的词为某种方言所独有，有的词为某一带地方所使用。凡是方言词，由于词面形式具有“异况”，因此也为人们所易感。然而，方言词汇同方言语音相比较，在向普通话转化的可能性上有所不同。方言语音里的某个音，要成为普通话的一个音，恐怕十分困难；但方言词汇里的某个词，却由于语用的需求，经过时间的陶冶，可以成为普通话里的一个词。正因如此，方言词汇同普通话词汇之间，有时会出现较为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方言词汇只能认为是“较易感”的要素。

事实表明，普通话从不把方言词拒之门外。有些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标注了“〈方〉”，但在第 5 版中“〈方〉”被取消了。例如“眼屎、夜猫子、浴缸、真格的”等。特别是“搞笑”和“搞定”，第 5 版还标注了“〈方〉”，到第 6 版，“〈方〉”被删除了。另外，“忽悠”是东北方言词，收入了第 5 版，标注“〈方〉”，释义为“晃动”；第 6 版中，也标注“〈方〉”，但增加了一个解释：用谎话哄骗。可见，方言词在“语言舞台”上充任什么角色，可以有所变移。^⑥

第三，方言词常常通过文艺作品得以传播。

所谓文艺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相声、语言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往往较多地见到方言词。仅就小说而言，作者使用方言词，存在有“明知而用”和“顺手写就”两种情况。

首先是“明知而用”。作者明知某个词是方言词，使用这个方言词，是为了突出地方风习或情调。作者一定跟特定地区有关系，要么是本地人

或本地附近的人，要么是在那里生活过。比如：走不动了，趔趄在路旁边光喘气。（张贤亮《肖尔布拉克——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趔趄”就是“蹲”，西安一带方言词，反映了西北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风习。张贤亮 1936 年生于南京，1955 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又如：不但中意，而且交关中意。（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交关”就是“非常、特别”，上海、丹阳等地方言词，反映了那一带人们说话的雅致和柔软。高阳是浙江杭州人。再如：她给每人都化了妆，怎么怯怎么捯饬。（魏润身《挠攘》）“怯”和“捯饬”是北京一带方言词。“怯”是俗气，“捯饬”是打扮。魏润身是北京人，选用了“怯”和“捯饬”，作品的言语因为很土俗很平民化而显得鲜活。

其次是“顺手写就”。常言：“习惯成自然。”作者使用方言词，是出于一种语言习惯。《红楼梦》这部小说，所用的语言跟北京话较为接近，但其中也有若干方言成分，特别是使用了不少扬州一带的词语。比如“家去”一词，出现频率相当高。略举几例：说着便家去了。（第 8 回）！又说了一会子话儿，方家去了。（第 10 回）！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间才得回来。（第 19 回）！你就家去才好呢。（第 19 回）！十二日不放家去。（第 21 回）！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第 24 回）有学者指出，“家去”不一定就属于扬州方言。^⑦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除了扬州之外，丹阳、牟平、哈尔滨也说“家去”。（第 3438 页）不过，不管怎样，《红楼梦》的用例的确是方言说法，不是北京话说法；而且，就事论事地讲，认为是用了扬州的说法，也是对的。就史实而言，曹氏家族与扬州有不解之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多次扬州接驾。曹雪芹少年时代曾随家人到过扬州，他迁居北京后也曾到过扬州。再说，《红楼梦》里所写的人和事，跟扬州有较多的牵连，这说明曹雪芹心里对扬州存有较多的念想。

“明知而用”和“顺手写就”有时可以互见。《红楼梦》里，也有“明知而用”的。举个例子。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第 3 回）这是林黛玉初进贾府初次见到凤姐，贾母对她介绍凤姐时说的话。其中指明“南省俗谓”。何为“辣子”？一般可能想到辣椒，但不一定就是指辣椒。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知道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等地指辣椒，但南昌却指能人，有本事的人。例如：“乡下个辣子，不敌城里个瞎子。”（第 5233 页）那么，贾母说的作为南省俗谓的“辣子”是什么呢？有学者指出：“辣子”并不是说凤姐“泼辣”，来自扬州的林妹妹一听就懂得，外婆是在打趣凤姐是个“无赖”。扬州人素称泼皮无赖为“辣子”，扬州评话里最著名的一出《皮五辣子》，讲的就是皮五这个“无赖”。^⑧请注意，在贾母所说的话里，前面就先出现了“泼皮”一词。

顺带指出：有的时候，小说中出现了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的交叉。比方，上文提到《红楼梦》里有“家去”。“家去”即“回家”，即“回家去”，事实上，《红楼梦》里既有“家去”，也有“回家”和“回家去”。有时，同一回就可以见到三者同现。例如：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第 7 回）！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第 7 回）！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呢。（第 7 回）同是第七回，前例用了“家去”，中例用了“回家”，后例用了“回家去”。特别是这个例子：你且家去等我，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儿去就回家去。（第 7 回）这里，前一分句用了“家去”，后一分句用了“回家去”。“家去”和“回家”都属于词汇系统，而“回家去”却是语法系统里的现象。在“家去”、“回家”和“回家去”之中，只有“家去”是方言说法。可见，方言说法和非方言说法在《红楼梦》中“和平共处”了，二者相互交融，不分彼此，如果不是有心人，是不大容易察觉的。研究《红楼梦》，如果能从语言运用的角度作深度切入，弄清楚种种事实的来龙去脉，从而更为详尽地了解曹雪芹的交游经历及其人文底蕴，“红学”成果必定更为丰满。诚然，研究重要作品中方言词的使用状况，需要做追踪性的深入考证。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语法

第一，作为语言要素，方言语法是属于隐约层面的要素。

总体说来，方言语法给人的感觉是隐隐约约，不那么清朗，不那么明显，无论是哪类相关现象，都需要细心识别，作深入辨察，才能描述恰切。以双宾语的位次排列来说。南方方言说“送一本书你”，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共同语里要说“送你一本书”，指人宾语在前，指物宾语在后。语言学家常用双宾语位置的差异作为典型现象，说明方言语法跟共同语语法的不同。其实，

即使是双宾语的位次排列，共同语和南片方言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毛泽东复信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人民日报》2006年4月8日）此例并非方言说法，但指物宾语“信”用在了前边，指人宾语“柳直荀夫人李淑一”用在了后边。

共同语里，有的时候双宾语表现为“指物宾语+指人宾语”。这样的用法，“动词+指物宾语”一共只有两个音节。整个“动词+双宾语”的说法带书面语色彩，多见于报纸标题。除了“复信”，还有“致函”、“复电”等，如：×××致函奥巴马 | ×××复电习近平。“复信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属于这一用法。

更多的方言语法现象，总体说是不外露的，不易直感的。比方，由“好+形容词”构成的“好”字句，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南方人特别喜欢使用。但是，“好”字句是否就是“南味”说法？不一定。比如：好香！在美国的我家，就永远闻不到这种味道。（冰心《空巢》）“好香！”这是“好+形容词”。但在《空巢》这篇小说里，仅仅出现这么一句，它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一定是广东人或港台人在说话。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脱离危险后会来这么一句：“好险！”仅仅是孤立的这么一句，同样很难说它一定就是“南味”的。

经过深入的研究，才知道“好”字句的南味感觉，往往取决于“好+形容词”的多次复现。以叶永烈选编《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来说，其中有很多“好”字句。例如：好高兴，好感动，也好伤心，这是我读了快信后的心情。（韩） | 这大心上的图案好丰满，好充实，好绚烂，好热闹，一看就知道是你选的，我好喜欢！（梁）——前例连用3个“好”字句，后例连用5个“好”字句，这就把“南味”凸现出来了。梁实秋出生于北京，后在台湾生活多年；韩菁清原籍湖北黄陂，七岁随父迁居上海，后在香港台湾生活多年。在一个地方长久生活的人，不会不接受该地方话语的影响。二人在书信往来中多次使用增添感情色彩的南味“好”字句，这是很自然的。^⑨

正因为具有隐约性，不那么显露，因此作者们在其作品里使用方言语法往往是顺笔写出，并非自觉为之。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讲说了他的语音知识和词汇知识，这是由其主观意识所管控的；作为广东佛山人，他在小说的行文中使用了不少粤方言语法现象，却是在不知

不觉中出现的。例如：我要你不起呀！ | 功名也要丢快了！ | 你家秋菊有回来么？按普通话的说法，上例应该分别是：我要不起你呀！ | 功名也要快丢了！ | 你家秋菊回来了么？然而，喜欢比较各地说法的吴趼人，在语法问题上，却无所觉察。这说明，跟大多数人一样，他是较为缺少这方面的敏感性的。第二，方言语法现象，有的跟语音和词汇相扭结。即：既是语法问题，又是词汇现象，而且有特定语音形式。

笔者家乡为海南黄流，在海南岛西南端靠海处。观察黄流话的数词“一、二、三”，可以知道以下情况：A. 关于“三”。黄流话的“三”，音[ta²³]。跟北京话略有不同的是，与“三”有联系的概念，在北京话里有两个合音形式，“三个”可说成“仨”(sā)，“三十”也可说成“卅”(sā)，而海南黄流话没有这样的合音形式。B. 关于“二”。黄流话的“二”有[no⁵⁴]和[ji³³]两个音。看两组例子：〈甲组〉二话 | 二重性 | 二元论 | 二部制 | “二为”方向——这里的“二”表统数，说话音为[no⁵⁴]；〈乙组〉二房 | 二副 | 二把手 | 二传手 | 二等公民——这里的“二”表序数，说话音为[ji³³]。其分工，比北京话的“两”和“二”更为严格。C. 关于“一”。黄流话里，不仅“二”分化为[no⁵⁴]和[ji³³]，而且“一”也分化为[iat⁴³]和[it⁵]。二者同样分工明确，分别表示统数和序数。比如：我们村里出了一（[iat⁴³]）个大学生。 | 此一（[iat⁴³]）杯酒，是阿娘要你喝的。——表示统数。又如：我们村里出了第一（[it⁵]）个大学生。 | 此第一（[it⁵]）杯酒，是阿娘要你喝的。——表示序数。

笔者写过一篇《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讨论了四个问题：1. 现代汉语数词系统的简匀性；2. 北京话中的“一、二、三”；3. 海南黄流话中的“一、二、三”；4. 关于现代汉语数词系统的思考。黄流话属海南闽方言，存在大量文白异读现象。白读音又叫说话音，文读音接近读书音。“一”和“二”分别有两个读音形式，也许来历不同，这需要进一步的追踪探索。笔者深感：如果能够把汉语数词系统里这样那样的形式、这种那样的因素全都弄清楚，让所有的形式和因素都归列于一个系统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汉语数词系统得到明晰的认识。如果进一步把汉语数词系统放到整个汉藏语系的背景中来作些考察，也许研究工作更有意义。^⑩

第三,跟许多词汇现象一样,方言语法现象往往是跨方言区的。

从大的方面看,跨粤、闽等大区的南片方言,就形成了若干特色。比如,有一种述谓项前移的现象。举例来说:她没有你好命。(台湾电视连续剧《星星的故乡》)=她没有你命好。|我们方便说话了!(台湾电视连续剧《婉君》)=我们说话方便了!|太多人熟知他的风流史。(香港陈浩泉《选美前后》)=熟知他风流史的人太多。|他又担心不够钱坐的士。(香港林燕妮《浪》)=他又担心坐的士的钱不够。

考察可知:(1)在这种述谓项前移的现象中,述谓项代表说话的着意点,即说话人心目中的表意焦点。说南片话的人,在表述某种意思时习惯上先说出着意点,先突出强调点,然后再追补有关的事实。(2)这种述谓项前移的现象,涉及的范围并不大。前移的形容词或动词,限于“好、方便、(太)多、(不)够”等十来个。但是,由于这些词很常用,述谓项前移现象的出现频率就相当大,所形成的句法形式也比较多。研究南片话语法,不能不注意这类现象。(3)南片话语区的作家,其母方言主要是粤语和闽语,他们在小说或电视剧中基本上用的是普通话,但也难免很自然地带进一些“南味”。这种“融合”,形成了南片话语区作家作品语言的特殊风味。^⑩

第四,跟词汇现象相同,有的方言语法现象可以向通语转化。这种情况,值得多加关注。

比方说,在南片方言中,有一种“有没有+动词”的疑问句式。例如:有没有上过四川馆子?|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目前,这种句式的使用范围已经涉及“东、西、南、北、中”,不仅仅限于南方人了。举几个证据:(1)各地的文学刊物上面,都可以见到这种句式。《花城》(广州)中固然常见,《当代》(北京)、《十月》(北京)、《收获》(上海)、《小说家》(天津)、《春风》(沈阳)、《长城》(石家庄)等上面,也都常见。(2)北京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这种句式。比如老作家刘白羽是北京人,他在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当代》1987年第3期)中使用了这种句式:大卡车有没有跟上来?|你有没有考虑,万一敌人在襄阳、沙市之间阻滞我们?(3)北京籍语言学家的言谈中,可以听到这种句式。语言学家马希文,北京大学教授,说地道北京话。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30日上午的语言学科组会议上,

他对李荣先生说:“这个问题,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研究过?”笔者当即记录了下来。凡是能够为共同语所吸收的方言句式,一定在语用价值上具有新的活力。这种句式的活力,起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句式可以通过口语化的方式表达多样的时态。有时,用来询问行为实现的经验性,相当于“是否曾经”,例如:“这些年你有没有回过老家?”等于说“这些年你是否曾经回过老家?”有时,用来询问行为实现的已然性,相当于“是否已经”。例如“妮娜有没有出嫁?”等于说“妮娜是否已经出嫁?”有时,用来询问行为实现的延续性,相当于“是否已经并且正在”。例如:“注意看看,敌人有没有追上来?”等于说“注意看看,敌人是否已经并且正在追上来?”另一方面,这种句式是原有的同义句式不可全然替代的。这种句式的原有同义句式有两个。一个为“是否+动词”。即“是否做过亏心事?”(=“有没有做过亏心事?”)另一个为“动词+没有”。即“做过亏心事没有?”(=“有没有做过亏心事?”)深入观察语言事实,可以知道,“是否+动词”书面语色彩较重。普通人在普通场合你问我答,使用口语句式“有没有+动词”才谐调。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梅超风向华筝讲述她和陈玄风的爱情故事,华筝同情地问:“后来你们有没有结合?”华筝是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姑娘,说话时绝对不会采用“后来你们是否结合了”这样文绉绉的口吻。深入观察语言事实,又可以知道,“动词+没有”也不能完全替代“有没有+动词”。在谓语动词是“看到、发现、感觉到、意识到”等时,前边如果用“有没有”,后边可以有较大的停顿,书面上加逗号。这样可以突出疑问焦点。在这一点上,“有没有+动词”的表达效果优于“动词+没有”。例如:你有没有想过,是谁把我们心爱的广州抢了去的呢?(欧阳山《三家巷》)要是改用“动词+没有”,说成“你想过,是谁把我们心爱的广州抢了去的没有呢?”这就显得很别扭,说起来比较吃力,听起来不如原来清楚利索。

凡是能够为共同语所吸收的方言句式,一定有其社会背景上的因由。上个世纪,我国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人们便通过各种渠道经常接触到了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华人习惯使用的语言。这些华人的母方言一般是粤语或闽语。一种语言或方言,使用它的人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强势引力,它就容易为人所模仿,从而发生影响。在上世纪

90年代前后,香港等地经济实力强劲,其影片、电视片人们爱看。同香港等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接触,使得这一句式的使用面越来越大,终于突破了方言区的范围,得到了普通话的接纳。这就涉及社会语言风情的问题了。^⑫

四、两点感悟

(一) 汉语方言是个巨大宝库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⑬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纵横数千公里的风貌,国家民族之兴衰,柴米油盐之盈缺,喜怒哀乐之情绪,吃睡拉撒之行为,都在这个宝库里标记成了语言符号。联系华人文化风情研究方言现象,不仅能够更为深刻地了解方言,而且还能“为整体汉语”的研究,为“历史学”、“考古学”、“地域学”、“气象学”等的研究,开辟更加宽广的天地。

然而,考究方言现象同文化风情的关系,当今大都还停留在程度不同的感性认识上面,要解释清楚其因果源流,极为困难。且不说语音和语法问题。词汇中的“马铃薯”,通称“土豆”,还有“洋芋”、“山芋”、“山芋蛋”、“山药蛋”、“山药薯”等叫法,情况错综复杂。仅以“土豆”来说,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可知:北京,又叫土豆儿;万荣,也叫洋芋;洛阳,多叫洋芋;长沙,土豆是新起说法,也叫洋芋头;黎川,解放后才引进。为什么前面的字用“土、洋、山药、马铃薯”?为什么后面的字用“豆、芋、蛋、薯”?跟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或者民俗背景有没有什么关系?作为学术问题,这些都是应该弄清楚,目前却还说不清楚的问题。

(二) 研究方言问题,特别需要弘扬以“崇实”为核心思想的朴学精神

朴学精神表现为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近年来,现代化的浪潮激发了国家的大发展,但是,急于求成、醉心摩登、浮躁夸诞、弄虚作假也随之泛滥,成了时弊。学术界华而不实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令人深感忧虑。因此,现阶段非常有必要强调“朴学”这种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风气。以方言语法来说,由于规律隐蔽性很强,要做好研究,必须脚踏实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要充分占有材料,据实思辨,不应疏而漏之;另一方面,心里要有读者,力求写出清楚明白的文章,让读者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⑭笔者忘不了一个小故事。1989年9月,美

国夏威夷大学有个关于汉藏语言的国际会议,笔者去参加了。当时,朱德熙先生在美国西雅图,承担美方关于汉语语法的一项研究,其中涉及方言语法问题。他也从西雅图到夏威夷来了。会议期间,他找到笔者,说他需要鄂东南方言中有关“的”“个”和“的个”的材料,希望帮他找人做一次调查,给他一份调查报告。笔者10月回到武汉,立即找到汪国胜等几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当时汪国胜31岁,是个讲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分别把调查报告写出来了。笔者把报告寄给朱先生之后不久,收到他的回信如下。

福义同志:

六月十一日发出一函,想已达览。这两天看寄来的材料,其中大冶(金湖)一份写得周到而且清楚,请向作者表示感谢。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要向他请教。

文中把特殊形式的形容词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包括AA、Ac等七种形式,第二类包括cA等五种形式。我的问题是:第一类如果后头不加“的”,能否作谓语、补语、状语或者单说?在这一点上,两类是否有区别?

我将引用这篇报告,请函告作者大名。著作权属于他本人,他可以随时发表。

谢谢您的支持。

问好

朱德熙

(一九九零年)六月廿五日

朱先生选用的报告,出于汪国胜的手笔。朱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研究生院院长,从不给青年学者廉价的赞扬。这位我国语言学界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精神的语法大家,一向强调尊重语言事实,既特别重视吸取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更特别善于用汉语语言事实来检验并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从而写出切合汉语实际的高质量著作和论文。^⑮“周到而且清楚”的六字评价,从内容到文字选用,都反映一种朴学意识。“周到”从何而来?来自事实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清楚”从何而来?来自行文的质朴老实,来自文字表达的为广大读者着想。比朱先生年长十多岁的吕叔湘先生,跟朱先生合写过《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至12月5日长期连载,一时传为美谈。吕叔湘先生写过这么一首诗:“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⑯吕先生的诗所表达的,跟“周到而且清楚”是同样的治学导向。

笔者把朱先生来信的复印件,连同汪国胜所写的调查报告,邮寄《中国语文》编辑部。几个月之后,他的论文《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在《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上发表出来了。^⑩过了3年,他的论文集《大冶方言语法研究》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⑪朱先生1992去世,仅72岁。去世前,他回国时笔者两次见过他。他每次都称赞汪国胜的那篇报告,而且每次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这个人,一定读过很多书!”笔者以为,汪国胜走上方言语法研究道路,跟朱先生的推动存在因果关联。

贯穿朴学精神的汉语研究,包括方言研究,最能折射出华人的文化风情,体现出民族之特质。方言语法规律,由于比较隐蔽,因此论题较难发现,发现了也不易做好。如何做方言语法研究,可以百花齐放,各人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擅长。汪国胜当年30出头,是个青年。现在,旧事重提,只是想强调,他的研究是脚踏实地、不赶时髦的。这一点,符合我国方言学界卓有成就的前辈们一贯的主张。很希望青年朋友们读读他那篇文章,琢磨琢磨朱先生“周到而且清楚”六字评语的内涵。

注释

①鲁先圣:《“老乡”赵元任》,中国教育新闻网,2007年10月12日。http://www.jyb.cn/cm/jycm/beijing/zgjyb/4b/t20071012_117866.htm

②张振兴:《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③乐毅:《水稻院士张启发认为“粳”字读错了》,《楚天都市报》1912年3月9日,第20版。

④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文中征引该词典时,均以夹注标明页码。

⑤李行健主编:《两岸常用词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96页。

⑥《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⑦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豆瓣网站,2009年6月7日。http://www.douban.com/note/35664088/

⑧《江苏扬州方言》,外语爱好者网站,2008年8月25日。http://www.ryedu.net/kjwy/yule/200808/9276.html

⑨邢福义:《南味“好”字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⑩邢福义:《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方言》1995年第3期。

⑪邢福义:《南片话语中述谓项前移的现象》,《邢福义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0-532页。

⑫邢福义:《“有没有VP”疑问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⑬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增订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⑭邢福义:《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光明日报》2006年8月8日,第5版;邢福义:《语言学学科发展三互补》,《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

⑮邢福义、谢晓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互动》,《汉语学报》2013年第3期。

⑯吕叔湘:《有感》,《吕叔湘全集》第6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0页。

⑰汪国胜:《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

⑱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 王雪松

Chinese Dialects and Chinese Cultural Flavor

Xing Fuyi

(Center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In China, there are diversified dialects in Chinese language, which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flavo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onetics, lexis and grammar. It concludes that, firstly, Chinese dialects are just like a rich mine of treasure. To study the dialects together with Chinese cultural flavor can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other disciplines; secondl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sist “respecting the fact” as the core of scholarship spirit in studying dialects, especially at present.

Key words : Chinese dialects ; phonetics; lexicology; grammar; Chinese culture; respect the fact; study empirically